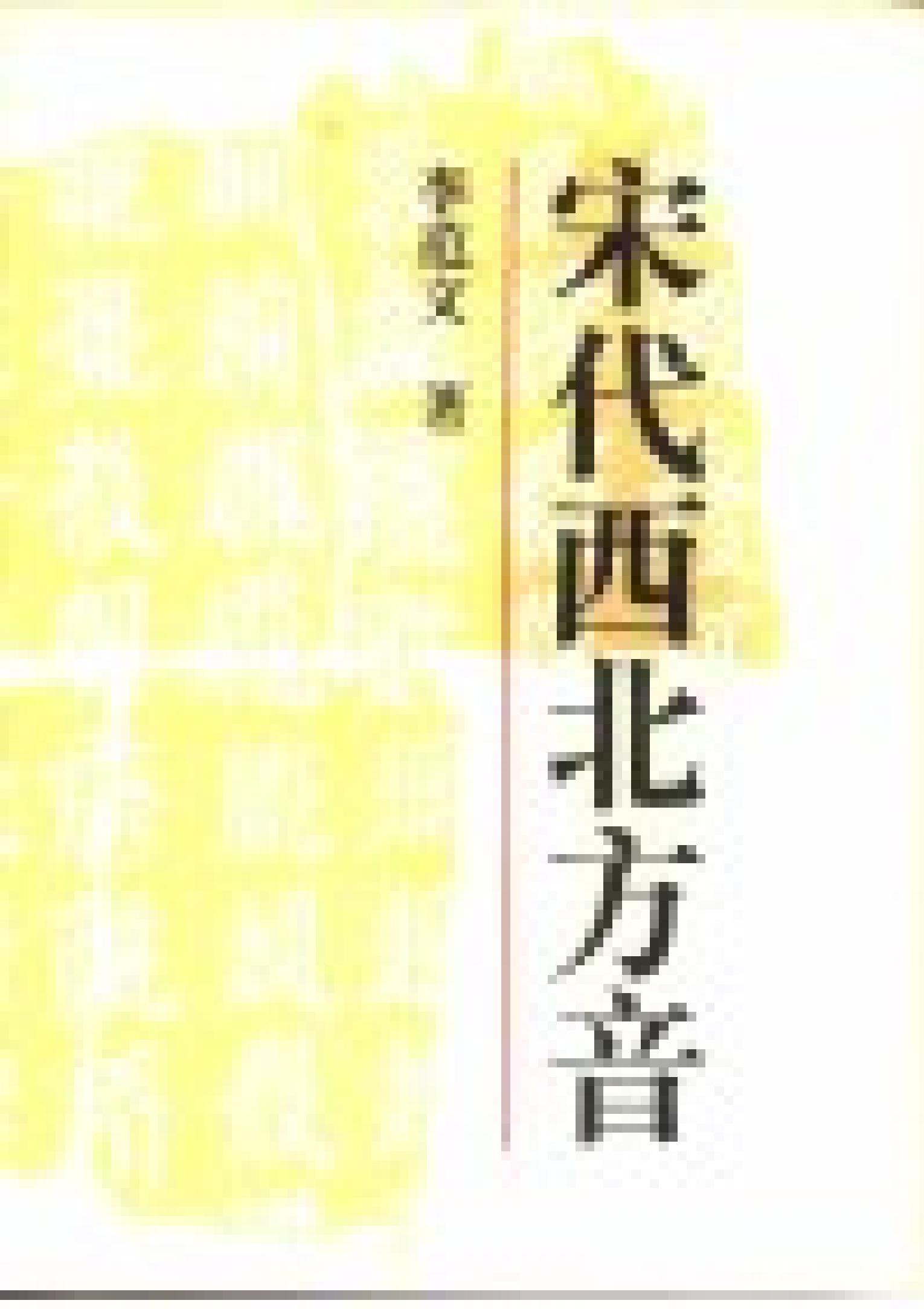


宋代西北方言音

李范文

著



大

年

正

月

北

方

宋代西北方言

——《番汉合时掌中珠》对音研究

李范文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京) 新登字 030 号

宋代西北方音
SONGDAI XIBEI FANGYIN
李范文 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编码 100720 电话 404153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怀柔中科印刷厂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34.25 印张 3 插页 500 千字
1994 年 6 月第 1 版 199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 册

ISBN 7-5004-1278-8/H·22 定价：72.00 元



作 者 近 影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引论	(5)
第二章 《掌中珠》两种抄本勘误	(11)
第三章 《掌中珠》注音释读	(43)
第四章 汉文复字注音与附加符号考释	(85)
一、复字注音考释	(85)
(一) 关于“尼×”的音值	(85)
(二) 关于“泥×”、“涅×”、“你×”的音值	(95)
(三) 关于“宜×”与“鱼×”的音值	(98)
(四) 关于“唃×”的音值	(101)
(五) 关于“夷×”的音值	(104)
(六) 关于“日×”的音值	(106)
(七) 关于“力×”的音值	(107)
(八) 关于“西×”的音值	(107)
(九) 关于“极枷”、“其贾”的音值	(108)
(十) 关于“直姑”的音值	(108)
(十一) 关于“妻合娄”的音值	(108)
(十二) 关于“丁谷”的音值	(109)
二、汉文附加符号的考释	(109)
(一) 来母加“口”变为日母	(109)
(二) 清声母加“口”变为浊声母	(111)
(三) 次浊加“口”变为全浊	(112)
(四) 表示汉语没有的西夏语音	(114)
(五) 其他	(115)
第五章 《掌中珠》的西夏语声母系统	(117)
一、帮 (p) 组重唇音	(118)
二、端 (t) 组舌头音	(123)
三、精 (ts) 组齿头音	(130)
四、章 (tʂ) 组正齿音	(135)
五、见 (k) 组牙音	(143)

六、影(o)组喉音	(149)
第六章 《掌中珠》的西夏语韵母	(157)
第七章 宋代汉语西北方音的声母	(209)
一、帮(P)组	(210)
二、端组	(217)
三、精组	(226)
四、章组	(231)
五、见组	(242)
六、影组	(252)
第八章 宋代汉语西北方音的韵母	(269)
一、韵值拟测	(281)
(一) a 摄	(281)
(二) o 摄	(285)
(三) e 摄	(289)
(四) i 摄	(291)
(五) u 摄 (一)	(291)
(六) ai 摄	(297)
(七) æi 摄	(297)
(八) ou 摄	(299)
(九) æ 摄	(299)
(十) an 摄 (一)	(300)
(十一) in 摄	(300)
(十二) aŋ 摄 (二)	(302)
(十三) əŋ 摄	(306)
(十四) ɔ̄ 摄	(307)
(十五) ə̄ 摄	(309)
(十六) ɛ̄ 摄	(309)
(十七) oŋ 摄	(312)
(十八) aŋ 摄	(314)
(十九) oŋ 摄	(316)
(二十) uŋ 摄	(317)
(二十一) eŋ 摄	(319)
(二十二) iŋ 摄	(321)
二、关于韵母问题	(323)
第九章 宋代西北方音与唐五代、近代方言比较	(327)
一、宋代西北方音的声系比较	(327)
宋华西北方音的韵系比较	(329)

第十章 《掌中珠》版本比较	(333)
第十一章 《掌中珠》校勘本	(375)
第十二章 《掌中珠》检字索引	(451)
一、西夏字检字索引	(451)
二、汉字检字索引	(483)
跋	(521)
英文提要	(525)
作者简历及著作（英文）	(534)

序　　言

这是我继《同音研究》之后写的一本书。1982年，我开始研究《掌中珠》时，曾写过一篇小文《鱼骨考释》。从前罗福成兄弟把“骨鱼”二字写作“鮀”一字，我误认为“鮀”当为“鮓”，与把“辣”写作“辤”一样，同为“搬家字”。“鮓”，匣母、黠韵、山摄、入声、合口、二等，古音读为 $\text{y}w\text{at}$ ，今音读为 hua。我的依据出自《山海经·东山经》：“子桐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余如之泽，其中多鮓鱼，其状如鱼而鸟翼，出入有光，其音如鸳鸯”。据此我断定“鮀”为“鮓”无疑。并决定写《〈番汉合时掌中珠〉校释》一书，得到宁夏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被列入1983年的出版计划。

但是这一工作进入注音解读时，我发现学术界对《掌中珠》的汉字复字注音有多种解释，比如“鱼骨”；误为一字者有之；认为辅音相切者有之；认为复辅音者也有之。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于是我只好中止研究《掌中珠》去继续研究《同音》。待1985年10月，《同音研究》书稿递交出版社后，我才将研究《掌中珠》的课题上报我院，得到院领导和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列为全区重点科研项目之一。这时我再拿出原稿，重阅《鱼骨考释》一文，不禁对考释中的错误感到惊愕，如果匆匆抛出，岂不贻笑大方？

正因为我研究复字注音时犯过望文生义、牵强附会的错误，所以这次对复字注音格外注意，专章阐述《掌中珠》复字注音及附加符号考释，即本书第四章。在全书写作过程中，为了检验自己的注音是否正确，经常将别人研究成果中的复字注音的解释和拟音，与自己的解释和拟音相互对比。在比较中我发现日本学者西田龙雄教授的拟音与我的拟音不同之处甚多。西田先生是我尊敬的西夏研究学者之一。他早在60年代就能写出《西夏语研究》那样的巨著，筚路蓝缕，

功不可没。我在 80 年代步其后尘，理应有所进步，有所发现。本书将西田先生对复字注音的拟音作为比较，绝非抬高自己贬低别人，而是为了在比较中揭开《掌中珠》复字注音之谜。

研究的过程也是我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首先，我觉得《掌中珠》的作者骨勒茂才不愧为西夏杰出的语言学家，他注音之准确，审音之严谨，即使八百年后的今天重加估量，也令人惊叹不已。更何况他已认识到语言是社会的交际工具，是沟通民族文化的桥梁：“不学番言，则岂和番人之众；不会汉语，则岂入汉人之数。番有智者，汉人不敬；汉有贤士，番人不崇。若此者，由语言不通故也”。

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教授撰写《唐五代西北方言》一书时，汉藏对音资料共有 523 个对音，其中有确凿年代者仅《唐蕃会盟碑》，它的对音资料只有 129 个不同的音。而像《掌中珠》这样一部有确凿年代和地望的汉夏文字互注的对音、对义双解词书，包括 1504 个西夏文单字，1360 个汉文单字，加上重复字，共约 8000 多字。由此可见，此书的学术价值极高。如果将它详加考释，对书中收入的每个字进行较为准确的拟音，供学术界去进一步研究，不仅对研究西夏语音韵，而且对研究汉语史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日本著名学者桥本万太郎教授早在 1961 年，曾在《中国语学》109 期上发表了《〈掌中珠〉番汉对音研究方法》一文。他指出：在研究宋代汉语西北方言上此书之所以未受到重视，乃是由于西夏语音韵尚未有成系统的研究使然。他认为随着西夏语研究的进展，汉语音韵学上一系列的重要问题，诸如全浊音送气与清音化，韵尾的消失等，将可获得解决。1964 年，西田龙雄教授在《西夏语研究》上卷附录了《〈番汉合时掌中珠〉解读》，第一次对汉字注音的西夏字进行了拟音。1981 年，我国台湾学者龚煌城教授在《十二世纪末汉语的西北方言》（声母部分）一文中，第一次用西夏文资料研究宋代汉语西北方言。他们对《掌中珠》的对音研究，都曾作出重大贡献。笔者才疏学浅，仅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作了一点资料性工作。

当我写完这本书时，情不自禁地忆起我的老师、同行和朋友的指导、帮助和鼓励。记得 1973 年 5 月，我第一次见到恩师罗福颐教授时，他已为我准备了一大摞西夏文图书资料，其中包括他本人的夏汉字汇集手稿及其先兄罗福成先生的《华严经》手稿，以及苏联聂斯克

的《西夏语文学》等等。我如饥似渴地整天攻读摘抄这些文献。他那种诲人不倦、助人为乐的高尚品德，至今记忆犹新。1977年，他还将多年来搜集整理的西夏官印拓本交给我译释。同年国庆节，我译释完奉还后，致书请教是否可写一篇《西夏官印考释》？他于10月5日即复函鼓励：“赞成您做《西夏官印考释》。我拿出去的资料，我绝不垄断，您尽量可以发表。”他的厚爱，使我受益匪浅。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时我国仅一部《西夏语研究》，当我在北京图书馆查出时，书却被他人借走。得知此书为民族所应琳同志所借用，我即冒昧登门求阅。初次见面，她竟以“远道而来，礼当先让”。语重心长，感人至深。

《掌中珠》是工具书，对它的研究，应力求准确，资料齐全，检阅方便，我在写作中尽力这样作，读者可从本书和目录、索引里看出我的意图。但也实难尽其精义，像这样难度很大的书，对它的研究，往往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

当本书快完稿时，从同行史金波同志那里得知他于1986年访日时带回美国学者鲁光东关于《掌中珠》的著作（The Timely Pearl, A 12th Century Tangut Chinese Glossary Volume I, The Chinese Glosses），承蒙他的厚谊复印了一份赠我。随后我又接到美国西夏学者邓如萍（R. Dunnell）博士惠赠的鲁氏原著，为此增加了第十章《掌中珠》版本比较，谨向他们表示谢意。

写作过程中宁夏大学高葆泰教授为我提供有关汉文资料，罗矛昆同志为我审稿，聂鸿音同志代我译《序言》，张素娥女士为我译《提要》，邓如萍博士帮我校译，卢桐同志帮助编写。此戋戋者，集师友之佽助，方蕡于成。又得我院领导和出版社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周用宜、徐菊芳两位女士热情而认真负责的精神，在此一并表示谢忱。书中错讹不妥之处，在所难免，诚恳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李范文

1987年6月8日

1989年3月7日 修改

1993年12月8日 审定

• 3 •

第一章 引 论

西夏人骨勒茂才所著《番汉合时掌中珠》（以下简称《掌中珠》），写于西夏仁宗乾祐二十一年（1190年），距今近八百年。此书写后不到四十年西夏即告灭亡，书也随着国家的破灭而湮没了。

1908年，俄人柯兹洛夫（П. К. Козлов）率领探险队来到我国古黑水城（Khara - Khoto）探险。1909年夏，柯氏从西藏再返回黑水城，专门对这座神秘的古城进行了广泛的发掘，寻找他梦寐以求的“神秘宝藏”。^① 他在城郊掘开一座古塔，这座古塔“送给探险队大量宝物，是一座拥有各种书籍、文卷和抄本的完整书库。”^② 据苏联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的登录编号，这种西夏文献总计8090号。其中就有《番汉合时掌中珠》，原书为刊本，蝴蝶装37页面：23厘米×15.5厘米。文面：18.7厘米×12厘米。每面分三栏，每栏四行；第二行为西夏文原字，第一行为汉字注解西夏文字音，第三行为汉字注解西夏文字义，第四行为西夏字注第三行汉字的音。该书收集常用词汇，内容按天、地、人分类：天类又分天体上、天相中、天变下；地类又分地体上、地相中、地用下；人类又分人体上、人相中、人事下。天类主要内容为日、月、星、年、时、季节等。地类为山脉、河流、海洋、湖泊、动植物等。人类为君子、小人、生理名称、道德修养、五常六艺、文化艺术、职官、机构等。该书因用夏汉文对照，故成为后世学者打开西夏文宝库的一

^① 戈尔芭切娃（З. И. Горбачева）、克恰诺夫（Е. И. Кычанов）：《西夏文写本和刊本》（俄文），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3年版，《导论》。

^② 柯兹洛夫：《蒙古·安多（АМДО）和故城哈拉浩特》（俄文），莫斯科—彼得格勒，1923年版，第554页。

把钥匙。“这本书对汉夏声韵学的重要性即在其注音上面。由于其为一人一时之作，材料的‘同质性’(homogeneity)无可置疑，年代完全确定，地域大体有个范围，材料也十分丰富，因此其材料具有相当大的价值。”^①全书约8000字，汉夏字各半，除重复字外，西夏单字约1500个左右。这本书是在西夏大型辞书《文海》（出版年代不详，大约在1128年前后）、《同音》（初编于1125年，1132年修订，1176年经梁德养重编，1187年刊行）、《文海宝韵》（写本）、《五声切韵》（1173年写）之后完成的，成书年代正是西夏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到高峰时期，作者骨勒茂才具有较高的音韵学水平，刊行后广为流传。仅黑水城出土的《掌中珠》版本即有七种之多。^②可见此书在当时是很受欢迎的。

我国学者最早见到《掌中珠》是1912年（壬子），由俄国学者伊风阁（А.И. ИВАНОВ）教授携其中一页至日本以示罗振玉先生，1913年罗氏又从伊氏处觅得十页，当即影印流传。1922年（壬戌），伊氏重游北京，到天津访问罗先生，带去全书影印本。1924年（甲子），罗福成先生于天津嘉禾里手抄影印出版，但仍缺第3、4、5、6、8页及26页第一面。其后罗氏又得苏联西夏学者聂斯克（Н. А. НЕВСКИЙ）寄赠数页，于1935年（乙亥）重校出版，但仍缺第26页第一面。1957年8月，罗氏重校补缺，名曰《百衲本番汉合时掌中珠》，“谋付剞劂，未能成约”。1960年1月，罗先生不幸谢世。1963年冬，其弟罗福葆将遗稿书写晒蓝发行，第3页第一栏署有“苏联伊风阁、聂斯克影赠”，书法精美，但笔误颇多。

国内学者对《掌中珠》的系统研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80年中山大学李新魁教授在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成立大会上，发表了他的《西夏语辅音系统研究》论文，对《掌中珠》和《同音》的语音系统结合藏缅语族的彝语、羌语和藏语进行比较研究。他认为《掌中珠》保存下来的夏汉对音材料“对研究西夏语音十分重要，必须充分加以利用”。他将《掌中珠》中用来注解西夏字的汉字，用宋代流行的36个字母加以归类，又将36个字母中的照组分为庄、童二组，

^① 萧煌诚：《十二世纪末汉语的西北方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二本，第一分册，第38页。

^② 戈尔芭切娃、克恰诺夫：《西夏文写本和刊本》，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3年版，《世俗著作解说目录》。

喻母分为云、以两组，将丛与邪母、船与禅母合并，共得39类。其结论有10：

- 1、西夏语没有轻唇音声母f等，而只有一个微母；2、送气音不很发达；3、用全浊音声母的汉字来注西夏字也不多；4、中古舌上音的知组用得很少，照二（庄组）、照三（章组）用得较多；5、不送气的清塞音和塞擦音字整、端、精、章、见组字用得较多；6、鼻音明、泥、娘、疑等组用得特别多；7、擦音心、书纽用得不少；8、可能没有x和χ声母的存在；9、影纽、喻纽用得不少；10、来、且纽较多。

1981年3月，我国学者龚煌城教授用《掌中珠》的资料，写出《十二世纪末汉语西北方音》^①一文，他认为“《掌中珠》里的对音资料可以说是完整而有系统的。”是研究十二世纪末汉语的西北方音“最重要的资料”。他用了107个西夏字来讨论汉语西北方音的声母问题。

作者最后认为：中古汉语的声母系统，经过一番演变的结果，到了十二世纪末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成为如下的新系统。

p	ph	m/mb	f	w
t	th	n/nd		l
k	kh	ŋ/ŋg	x	
ts	tsh		s	
tʂ	tʂh	n'/n̩dʒ'	s' z' ʐ'	j

1981年8月，兰州大学李蔚副教授在银川召开的西夏研究学术讨论会上发表了《〈番汉合时掌中珠〉初探》一文，他从史学角度对《掌中珠》的成书背景、编写特点和史料价值进行了研究。作者引证该书《序言》：“今世人者，番汉语言可以俱备。不学番言，则岂和番人之众；不会汉语，则岂入汉人之数。番有智者，汉人不敢；汉有贤士，番人不崇。若此者，由语言不通故也。”这说明编写该书的目的是为了便于西夏人学习汉文，汉人学习西夏文，增进汉夏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在客观上反映了汉夏人民的共同愿望，有利于汉夏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作者认为经济上的长足发展，必然带来文化上的高潮。西夏中期，乾顺和仁孝父子二人统治长达近110年之久。他们崇尚儒术、兴学育才，

^① 龚煌城：《十二世纪末汉语的西北方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本，第一分册。

把西夏文化一步一步地推上了繁荣昌盛的高峰。而《掌中珠》一书，正是语言学家骨勒茂才在当时文化事业不断发展的形势下，适应了汉夏人民互相学习彼此文化的需求著成的。

在内容上，李蔚认为该书的突出特点是“赤裸裸地宣扬三纲五常、学而优则仕，鼓吹法律、镇压和劝人皈依佛教。”在体例编排上，“大体上相当于中原王朝所编的四言杂字。这种奇特的安排，构成了该书的又一特点。”在史料价值上，李蔚认为有两点为《宋史·夏国传》所无：第一，记录了一些《夏国传》所没有的名称，如经略司、正统司、殿前司、皇城司、宣徽（院）、内宿司、巡检司等中央机构的名称和州主、通判、都案等地方机构的名称。第二，《宋史·夏国传》虽然正确地指出西夏政权的性质是以党项贵族为主，以汉族地主为辅，包括其他少数民族上层统治者参加的联合统治（“皆命番汉人为之”），但并未明确指出，西夏的中央集权政治究竟达到何种程度，而《掌中珠》比较明确地指出了这点。在西夏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区别上，作者引用《掌中珠序》说：“论末则殊，考本则同”。又引用柳诒徵所著《中国文化史》的话说：“夏虽以武力背宋，其于文化未尝背宋也”，以证明夏、宋文化同属一体。

国外研究《掌中珠》最早的是俄国人。1909年，当柯兹洛夫从我国黑水城将这批珍贵的西夏文物运回彼得堡，交由地理学会保存，彼得堡大学副教授伊凡阁（А. И. ИВАНОВ）就开始了登录和研究。他从中发现对音字典《掌中珠》的部分残页，立即写了《西夏语简介》一文，发表在当年的《俄罗斯科学院院报》上。^①但是，由于他对《掌中珠》的汉文复字注音尚未了解，读音顺序还不清楚，致使其将“尼卒”、“尼征”、“尼顷”误读为“卒尼”、“征尼”、“顷尼”，将“哿”误读为“即”，将“斜”误读为“料”，以及将“成”误读为“母”等。

伊氏的文章引起了美国学者劳佛尔（B. Laufer）的注意。劳氏于1916年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发表在《通报》上。^②他认为西夏语与彝语、纳西语有密切关系，应归入西罗么（SI - LO - MO）语系。但是，伊氏的错误，也使劳氏受到影响。例如：“尼顷”，劳氏误拟为 Cin - ni 或 ci - ni，并与纳西语 je (dze) 联系起

① 该报第六种，第三卷，1909年，12—18号，第1221—1233页。

② Berthold Laufer: The si - Hia Language, a study in Indo - Chinese philology. T'oung pao, Vol. XVII.

来，这显然是错误的。但他们对原始资料进行开创性的探讨，筚路蓝缕，功不可没。

1961年，日本学者桥本万太郎教授发表了《〈掌中珠〉的西夏文、汉文对音研究方法》一文。^①他根据《同音》、《文海》、《文海杂类》、《文海宝韵》、《五声切韵》等资料，对照《掌中珠》，为西夏语声母拟测了25个辅音。

1964年，西田龙雄教授出版了《西夏语研究》第一卷。他在该书第一章对罗振玉父子抄写出版《掌中珠》予以高度评价，同时对所缺的第26页第一面，据聂氏文章补充了26个西夏字。他的研究比桥本教授更进一步，不但根据有关资料为西夏语拟测了音系，并为《掌中珠》汉文注音注上了他的拟音。西田教授对《掌中珠》的研究、注音、补缺等做了大量工作。但他对西夏字的汉文复字注音，尚有值得商榷的地方，笔者将在第四章里详细论证。

苏联知名的西夏语研究学者中，不论是克恰诺夫（Е. И. КЧАНОВ）、索夫洛诺夫（М. В. Софронов）还是克平（К. В. Кепинг），在他们的著作里都大量引用过《掌中珠》的有关资料。由上述的简介中，可以看出《掌中珠》一书不仅在仁孝时期成为夏汉学者互相学习、增进了解的工具书，而且也是我们今天研究西夏语言文字的学者不可或缺的“掌上明珠”，值得我们重新校勘，作进一步研究。

^① 见《中国语学》109，1961年，13—16页。